

一个自强不息值得尊敬的学者

——悼念“聊友”黄延复学长

○孙殷望（1961电机）

最近两三年内，接连有几位好友相继病逝。在同感伤悲痛惜之中，届时的心境又略有差异。一种是因身患癌症无力回天（如徐葆耕、承宪康等），对他们的离去多少有点心理准备，故在叹息之余更多的是无奈；另一种则是惊愕，明明前两天还老当益壮、谈笑风生，却不料转眼间就驾鹤腾云、飞向天国，令人难以置信。与我彼此戏称“聊友”的黄延复学长即属后者。

大年除夕上午，我打电话给黄兄拜年。在相互祝福之后，他侃侃而谈了近半个小时，介绍了自己近来的得意之作和正在撰写的书稿，自嘲了自我养生之道及其“神奇”效果，并约定元宵节前后找几个他熟悉的中文系教师聚一聚。通话中，他思路清晰，情绪振奋，语速顺畅，前几年因中风而落下的后遗症似乎已近消失，其精气神根本不像是个耄耋老人。正月初二下午，我因有事相商，再次拨通电话，其外孙女却告知：姥爷刚刚在楼下遛弯时摔了一跤已不省人事送往北

医三院抢救了！当时我还寄希望于他能像前两次重病（多年前的一次急性胰腺炎和一次中风）时一样，能够再度逃过一劫，化险为夷；期待着春暖花开之际一帮“聊友”能再次欢聚、痛快“话疗”。但是，这次终未如愿。正月初四一早，电话铃响了，一听到黄夫人的声音就顿感不妙，果然黄兄已于昨晚因大面积脑梗永别了！随后，我受黄夫人之托，逐个给“聊友”们通报噩耗，他们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都是“啊？！不可能吧！”在惊愕痛惜之余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年龄在“聊友”中排行第三且被公认为有点“返老还童”的黄兄，竟在新春佳节之中第一个“离家出走”了。



2012年5月17日，黄延复（前排右3）与部分聊友聚会，后排左1为本文作者

黄延复学长，祖籍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终年86岁。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入读银行专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57年在任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位上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命运多舛，当过印刷厂工人，校刊《新清华》的校对，原有的满腹文采也难以展现。由于他比我年长10岁，属“师辈学长”，同在清华园却咫尺天涯，素未谋面。

最初的相识，竟缘于“文革”期间的特殊境遇。当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将全校7个公共教研室（包括数、理、化、力学、外语、政治、体育）合编成为“基础课连队”，或许由于我出身好且派性不强，被委任连部“政工组”和“清队领导小组”负责人之要职，黄兄等10余人就成为我管制下的“清理对象”。或许我“红”而不“左”，“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对他们的“管制”较为宽松，所以后来“红”与“黑”之间并无仇隙，彼此大都成了朋友。有一次我给了黄兄两张演出票，却让他感到“享受了一次‘革命群众’的待遇”。这件事我早就忘了，而他竟铭记在心，几十年后多次提起，仿佛我真的给了他什么“恩惠”似的。这件事对我的心灵触动很大！我想，从“反右”到“文革”近2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不知开过多少次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批判会，受批判的往往是像黄兄这样被打成“右派”或因其他种种原因被“打入另册”的受害者。他们在蒙受冤屈遭遇冲击之时，哪怕是听到一句还算公正善意的话语，也会心怀感激并牢记不忘。相比之下，像我等这样因出身好而往往充当“天然”的“批判

者”，在回首往事时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奉命“上纲上线”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并心存愧疚呢？！所谓“往事并不如烟”，像黄兄这样受过伤害的人，在抚摸“伤痕”时发几句牢骚，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由于角度不同而存有一些“偏见”，似可视为情理之中而不必苛求。何况，“牢骚”里面或许含有相对真理，“偏见”之中或许也有“另类”真知！

正是抱着这样的认识和态度，我们几个退休后的党员教授与黄兄结为“聊友”，而且聊而不倦，乐此不疲。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聊题，大家随感而发，各抒己见，平等讨论，真诚交流，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自然自得，乐在其中。有时因观点不同而生争执，甚至吵得面红耳赤；有时又相互揶揄，彼此“揭短”，以至令人啼笑皆非。但这些“矛盾”总会在一阵“嬉笑怒骂”中很快化解。这种被戏称为老年人“养生秘诀”之一的“话疗”，其“疗”效颇佳，我和黄兄正是藉此从相识到相知，从“聊友”进而成为诤友、挚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已知天命的黄兄时来运转，他长期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底蕴所养成的哲思和文采终于得以尽情展现，并在清华校史研究上独树一帜，开花结果。1978年以后，他作为老校史组的一员，开始集中研究老清华的校史，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诸多研文。1989年退休后，20多年来一直自研不止，笔耕不辍，取得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的学术成果。其中，对梅贻琦校长的研究最为突出，共有6本编著出版，即：合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1993）、独著

□ 怀念师友

《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1994）、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1995）、合著《梅贻琦与清华大学》（1995）、合作整理《梅贻琦日记》（2001）、合著《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2011）。被称为国内研究梅贻琦教育思想“时间最长、观点最鲜明、成果最多的权威学者”。此外，他还有10本编著问世，即独编《马约翰体育言论集》（1986）、合著《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1995）、独自编著《图说老清华》（2002）以及5部独著：《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2000）、《清华的校长们》（2003）、《清华的大师们》（2005）、《清华的学子们》（2006）、《清华传统精神》（2006）、《清华大学校园今昔谈》（2011）；另有一部合著的《清华园风物志》，1988年出版后又出增订版，成为“导游”清华园必读之“权威”著述。

在此期间，他在报纸杂志上还发表了200多篇各类文章；近几年又“玩”起了博客，据说还拥有众多粉丝。上述著作和文章，绝大多数是在年近古稀之后写成的，有一部分更是在偶发“脑栓”又突发“心栓”（旧病）、身处“苟残喘”（自嘲）的状况下坚持而就，实属难得，堪称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从中可见其精神之可嘉，心智之超群，潜能之巨大，毅力之顽强。毋庸讳言，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包括对清华传统精神的诠释、对清华校史人物的评价、对中国教育理念的见解等，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存在争议，既有大加赞许，也有“不敢苟同”。

本来，学术之争就是见仁见智，最终得靠实践和历史去检验。但有一点应当

肯定：黄延复学长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校史研究者，应当受到尊重；他的诸多研究成果，应当予以重视；他在研究工作中所体现的奋斗精神，所付出的心血汗水以及为清华校史研究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应当得到赞许。

2013年2月14日（正月初五）早晨6时，我作为几个“聊友”的代表，乘车出发去昌平殡仪馆向黄兄最后告别。当我凝视着他那有些发暗但神态安详的面容，回想起与他相处的一幕幕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原来阴阳相隔，天上人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所谓人生苦短，尚存者应尽力有所作为，而黄兄为我等作出了榜样。他是一个历经坎坷、自强不息、多有建树、值得尊敬的“清华人”。他的著作中所印记的校史及其人物的足迹，将铭刻在清华水木之中，一代代学子后生也将从中受到启迪，获得教益。

在告别后返校的车中，我构思了一首悼词，现录于此，作为本文的结束，也以此为黄兄送行。

西江月·痛悼“聊友”延复兄

聊音依然在耳，
转眼驾鹤西飞。
正在欢时却离悲，
天阴月缺心碎。

一生命运多舛，
晚年路转峰回。
潜心研史自立碑，
赢得声声赞佩。